



余姚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余姚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封面题字：成 卡

封面设计：才 华

准印证号：浙出书临(87)86号

定 价： 1.00元

余姚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余姚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九月

目 录

我地下情报联络站——“鸿兴面店”

.....市公安局公安史办公室（1）

姚北农民打“浆局”.....诸焕灿整理（7）

日寇在姚罪行录.....诸焕灿整理（12）

解放前余姚报刊掇述.....许扬武整理（20）

报刊忆杂——访姜枝先先生谈余姚报刊.....陆而天（27）

余姚盐务史略.....**王幼章**（35）

余姚钱庄业初考.....陈均铨 市政协文史办整理（54）

余姚是干菜笋之乡.....楼永庄、胡 原（65）

龙泉山的景变和梨洲文献馆的创立.....姜枝先（71）

龙泉山碑亭新貌.....姜枝先（76）

浙东第二藏书楼——五桂楼.....符伯望（78）

梨洲中学创办史.....姜枝先（81）

近百年余姚书画人所知录.....黄本端（84）

琐谈录入书刊之余姚籍历史人物.....钟 号（93）

鲁迅书信、日记中的余姚人.....童 心（96）

诗人、翻译家、文化出版家——邵洵美传略

.....朱可淦 邵伯衡（104）

勤求古训 辨证诊治——馍剑山祖传中医妇科

.....陈千金（110）

1943年姚北霍乱见闻记…………… 孙儒堂（118）

余姚基督教简史……………市府宗教办 市政协文史办（123）

余姚庙会考…………… 邹松寿（127）

余姚农谚…………… 市政协文史办公室（146）

为《余姚文史资料》一、二、三辑出版颂……………王时申（77）

我地下情报联络站

——“鸿兴面店”

市公安局公安史办公室

一九四〇年夏，国民党顽固派推行反共政策，到处逮捕、杀害我共产党员，破坏党组织。中共余姚县委为贯彻执行党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把公开的党组织与面目较红的党员转入地下工作。在此情况下，县委把党员闻志林（注一）从马渚区调到余姚城内，要他在北城宪卿第弄口以“鸿兴面店”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开始，“鸿兴面店”因资金缺乏，设备简陋，单一卖些汤面，没有其他花色，其实是一家面摊而已。小店配备了三个人，闻志林以面店老板的身份，掌握全面工作，兼管面条的加工手艺；其妻吴爱宝当营业员，接待顾客；另一个是俞章友，他是闻志林的外甥，年龄尚幼，只能做一些杂差工作。这样，他们天天开张营业，接待往来顾客，关注着姚城的动静。

一九四一年三月，中共余姚县副特派员赵如翰（注二）负责联系姚南山区和城区工作，曾来到“鸿兴面店”与闻志林接上了关系，并成立了党支部。赵如翰兼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参加支部的人员有韩吾真（陈刚）、闻志林、洪文焕（女，胜山

分路昇学校教员）、邵炳楠（候青门万源轧米厂学徒工）和沈士芳（庵东学校教员）等六人。

是年四月，余姚陷入日寇之魔掌，“鸿兴面店”即成为敌占区内的地下联络站，担负着更为重要而艰巨的情报联络任务。一九四二年秋，赵如翰调离余姚，韩吾真（陈刚）接替，负责领导地下斗争活动。韩吾真是人寿丰药店的学徒，沦陷前是余姚抗日救亡商业人员工作队（简称“商工队”）的队员，对上层人士接触较多，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在此期间，余先与周天军住在胜山闻家后弄的闻志林家中，余先化名为陈学甫，当地群众都称他为“陈先生”。他们两人以贩卖余姚土布做掩护，来回于姚北的交通线上，早已与闻志林接上了关系。

一九四二年以后，“鸿兴面店”随着生意兴隆，营业范围逐渐扩大，上门顾客越来越多，接触社会人士及伪军的机会也就多起来了。尤其是伪余姚保安团（简称“姚保”）的第二大队，驻扎在后青门火车站附近的井头庵一带，与“鸿兴面店”较近，伪军官兵时常来店吃喝，闻志林就以“老板”的身份和“好客”、“讲义气”的姿态招待他们。日子一久，互相熟悉起来。如伪姚保“二大”副官董文龙（浦东人），平时喜欢吃吃喝喝，闻志林等掌握了他的特点，采取递烟、敬茶以及优惠等手段应酬他，便与他第一个交上了“朋友”。接着又来了特务长高梦根和班长陈洪飞（均浦东人），也成了闻的“知己”，无话不谈。闻志林在交谈中，以探问情况或是“关心”的姿态启发他们下乡要眼头活络，遇到紧急、危险时刻，切不可硬拼，更不要为日本人卖命送死……，这对伪军起到了分化瓦解、丧失士气的作用。

当年的姚城，敌伪势力庞大，守备甚严，日寇的宪兵队、

伪余姚保安团、侦查队、守望队以及便衣特务、汉奸，随时出动巡逻或盘查，对我三五支队人员进行监视。我党为了开展革命活动，随时要派人员进城或来“鸿兴面店”开会与工作，闻志林考虑到首长和同志的人身安全，假借自己“行动方便、自由”为名，向姚保“二大”副官董文龙借来一块印有黄色“浙东保安队”字样的袖章。有了这块“护身符”，便可免去侦查队特务分子的检查，上街畅行无阻。平日，闻志林总把袖章藏在身边，万一遇到我首长及同志进城来，他紧跟身旁，随时做好保卫工作，有时遇上特殊情况，便凭袖章用“自己人”的手段掩护过去。有一次，我三五支队司令部侦察参谋张任伟化装来城侦察，那天，他趁时间还早去钟表店修表，不料，身后跟踪的一个特务也走进钟表店里，张当时看到表不能立即修好，需要几天后才能取，就灵机一动，对修表的人说“我从宁波回来再来拿表”，立即离店。而那特务误以为这家钟表店是我三五支队联络的地方，回去报告上司。其实张任伟没乘轮船去宁波，却来到“鸿兴面店”听取闻志林的情况汇报，于当天下午三、四点钟，在闻的陪同下安全离开姚城。

一九四三年初，姚城“鸿兴面店”联络站情报工作的局面基本打开，搜集情报来自四面八方，大致有三条联络线：一是与姚南县办朱之光保持联系；二是与在十五岙的四明交通总站翁惠珍保持联系；三是与姚北地区周曼天保持联系。其他还有一些联络关系。联络站的人员有姚南南庙的鞋匠师傅黄增祥，陆埠附近十五岙的陆晓增，梨洲乡伪副乡长沈瑞云（地方党员），姚南县办的谷之明、楼友坤，余姚南城棣星桥的韩月香，北城武胜门桥南首的闻秀娥（闻志林之姐）。他们把搜集到的情报，做到迅速、绝密、稳妥。在传递上，如属一般情

报，派闻志桐、俞章友传送，凡重大的紧急情报，则由闻志林亲自送往有关目的地。

是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闻志林从姚保“二大”的班长陈洪飞处，得悉第二天凌晨将有日寇百余人，配合伪姚保、侦查队共约三、四百人，去陆埠方向对我进行“大扫荡”的特急情报，闻志林感到情况万分火急，如不及时把情报送出，后果不堪设想。他当晚就赶到南城石巍桥，绕过敌人设置的铁丝网，越过步哨线，冒雨涉水，赶到慈南袁马村（现属余姚），找到张任伟作了汇报。我军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部署兵力，选择有利地形，把主力部队埋伏在陆埠附近的一个山岙旁的大庄殿两侧。果然，是夜一点左右，敌伪军朝着陆埠附近十五岙北首蜂拥而来。我军一俟敌伪军进入伏击圈时，就用猛烈火力发起攻击，敌伪军猝不及防，刹时乱作一团，在一片狼狈的惨叫声中窜回姚城。这次战斗，击毙日寇小队长大富一名，伤亡惨重，士气大丧，粉碎了敌人“扫荡”的阴谋。第二天清晨，打扫战场，拾起敌伪军仓皇溃逃时失脱的皮鞋有好几箩。

一九四三年秋，党组织派闻志林去马渚斗门侦察伪姚保据点的任务。由于斗门据点的驻军属伪姚保“二大”一部分，闻志林对他们多数士兵相识，进入据点当然不成问题。于是，闻志林借走亲戚为名，独自来到马渚，又以“看望朋友”（指伪军），进入斗门据点。不出所料，伪军一见“闻大哥”（伪军对他的称呼），招待热情周到，并向他介绍了据点的有关情况，还陪同他在据点周围转了一圈。闻志林在谈话和观察过程中，见到据点设置在斗门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大约有百余兵力，坡上无房屋，伪军都住在油布搭成的棚内，小山坡两侧的下面，是两挺机枪的火力点位置。闻志林把伪军的活动规律也

掌握住了：原来伪军姚保胆小如鼠，晚间只设几个岗哨，其余都躲进棚内不敢外出扰乱。经过一个多钟头的详细侦察，已把据点地形、武器、火力网以及行动情况默记在心。返姚以后，立即将侦察到的情报，向我三五支队和余上县办详细报告。

是年底，隐蔽在姚城的韩晋真，因被日寇、汪伪组织怀疑为“三五支队潜伏在姚城的情报处长”，撤离余姚，去慈东庄桥轧米厂工作，就与“鸿兴面店”脱离了联系。

一九四四年秋，余先调入余姚城工委而被调入“鸿兴面店”负责领导工作。他以帐房的职务、职员的身份与闻志林一起专门搜集敌伪情报，同时配合外围组织，向姚城敌伪军及人民散发、张贴我党各类传单和宣传品。他们二人把姚北送来的传单和标语，当夜深人静之际，分头张贴在街头巷尾，有时折成小条子，塞进较大商店的门缝内，这对鼓舞姚城市民对敌斗争意志，动摇敌伪军心，削弱敌伪战斗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避免内战，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电令浙东区党委撤向苏北。九月底、十月初，我浙东党政军万余人奉命北撤。闻志林留守“鸿兴面店”，继续坚持地下斗争，直到余姚解放。

注一：闻志林同志现仍健在，系余姚商业局离休干部，余姚胜山闻家后弄人（即现城北乡永丰大队后弄）。一九三八年在马渚由方康泰（政工队区队长）同志介绍入党，原在马渚面店工作，一九四〇年余姚沦陷前受党组织调派到余姚开“鸿兴面店”。在日寇、汪伪统治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搜集情报十年之久，从未暴露。

注二：赵文翰，又名肖张、张云，诸暨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诸暨县横山区委委员、诸暨县青年委员

会负责人，中共宁绍特委青委委员、中共诸暨县委委员等职，一九四一年二月调到余姚，任中共余姚县副特派员。一九四二年秋，率地方武装“余姚中队”参加主力，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四日，在鄞西后屠桥战斗中牺牲。

姚北农民打“浆局”

诸焕灿 整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姚北曾发生过一次农民打“浆局”的事件。事情还得追溯当时的历史背景。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甚至使鸦片也可在国内畅行销售，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为了对外来鸦片多少有所抵制，只好放任民间种植罂粟，括取浆膏。宣统元年，浙江巡抚增韞曾奏称：“……浙江环山滨海，半系产浆之处……。绍兴之会稽、余姚……，现据各属呈报种烟地亩表式，计丙午（1906）年共四十七万三千七百一十八亩有奇。”

罂粟每年春种，五月成熟。用小刀刮取花萼上浆汁，贮竹筒中，经煎炼成膏浆，就成黑色的鸦片，俗称“浆膏”。在余姚吸鸦片的人日见增多，名为“抽寿膏”。烟商采办种子，放任农民种植。因而，姚西姚北一带，种植面积达一万三千三百零五亩之多，年产量最高曾达四万四千三百五十斤。据《六仓志》载：“按海地种罂粟，种自天台传入。初种植者，不识收制之法，多雇用台人。后则习其法，日渐广种，产量至巨。”如种植得法，亩产可达十斤，收入可比一般农作物多二、三倍。

清政府为增税收，拟定多种捐税名目，并设立“浆局”机构，官商通过“浆局”，双方都从浆农身上取得了很大好处，

因而浆农则视“浆局”为眼中钉。

余姚首先由蒋裕大、胡焕文、沈少梅、黄泉丰几个浒山乡绅包捐设局，局址在浒山镇黄泉丰竹园。

打“浆局”是四月廿二日，东北乡农民为反抗征收重额浆捐，便联合好几百人，手拿各种农具和木棍，纷纷进入浒山城。先焚烧了“浆局”，捣毁了浒山巡检司衙门。然后又赶到蒋裕大及沈少梅、胡焕文三家，捣毁了三家的房屋和器具。消息传到余姚城，知县恽遐龄立即派出二十名兵丁去浒山弹压，就同农民发生了冲突。在街上有两个农民被兵丁用刀劈死，又一兵丁还想劈一个叫黄树宝的人，黄树宝用洋伞抵挡，并抬脚踢倒兵丁，夺枪而走。兵丁见农民人多势众，难以镇压，只好溜出西门越过施家山回姚。

恽知县随后赶到浒山，扬言要拘捕暴动为首者，一时更激起众怒。农民们围住知县，把知县拖到城隍庙，将他的红缨官帽也丢进粪坑里。巡检司的千总林宝荣只身躲藏在方井头粪坑边发抖。这时，有一个叫余德耀的铜匠，见县太爷被捉，害怕事情闹大，出来阻止群众，给知县解了围，还陪送出西门，用船送知县回姚城。几天后，恽知县认为德耀铜匠一句话就能劝住群众，认定他就是暴动的为首者，于是即将余德耀拘捕定案，杀了头。还把头盛在木笼里，运到浒山，挂在原“浆局”的一棵桃树上示众。但是，到了夜里，就有人打碎木笼，把余德耀的头偷去埋葬了。

经这一场风波，浒山“浆局”也就无形地停办了。

过了近十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姚北的罌粟种植特别兴旺，引起了周巷绅士徐蓉舫(举人)、百总老爷劳阿兴、歪坯陈增云的垂涎。就与姚城豪绅朱复初(绰号“尿瓶菊

花”）串通协议，向县衙门呈请包得浆捐，在周巷开设“浆局”，对周巷周围地区的土药浆实行包捐抽收，不准私人卖买。他们在平王庙向磨坊主唐茂昌租了两间房子，作为局所，悬牌收浆征税。鉴于浒山“浆局”的风波，还特意派了六名兵丁作为缉私兵以保护“浆局”。收浆开始后，尽力压低浆价，百般挑剔，重利盘剥。浆农稍有计较，即以官府牢房相威吓。因而，浆农们积怨填膺，对“浆局”恨之入骨。

周巷近旁有沙黄和义让两村，种植罌粟最多，同“浆局”的积怨也最深。沙黄村里有沙来狗和沙来春两家贫农，在村里很有些声望。有一天，因出售浆膏受了“浆局”的气，回村就对村民说：“要使红脚梗的汗血不白流，大家必须把‘浆局’打倒。周巷臭乡绅的力量，不会比浒山强多少。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天大的事也不用怕。”村民们正要找机会出气，现在有人出头，自然一呼百应。他们分头动员全村各户，又用红贴传送附近几村，邀集力量，统一行动，约定四月初六五更鸣锣集中出发。

就在初五下午，陈增云先得到了要打“浆局”的讯息，连忙告诉朱复初、徐蓉舫、唐茂昌，预先将家中细软移藏他处。

初六五更，锣声震响晨空，一千多农民以村为队，用长竿系布褡为旗帜，高举大刀、锄头、铁耙等武器，向周巷镇进发。赶到“浆局”，天还未亮，局内只剩下两名兵丁，其余均潜逃一空。农民们先把这两名平时惯会作恶的兵丁痛打了一顿，然后用绳索把两人赤膊捆绑起来，捣毁了“浆局”的全部房屋器具，再到陈增云家进行捣毁。这时天色大亮，庵东、长河、天元、高王、胜山、白沙路等远近各村农民也都闻讯赶到，群情更为高涨。他们牵押着两名兵丁，过西去打徐蓉舫

家。八点多种，农民们赶到徐宅，隐藏在徐宅的护宅人员见农民人多，就糊乱开枪，打中了一个人后，都逃走了。农民们见有人被打死，一时怒火愤烧，立即将徐宅放火烧了个精光。这一天，朱复初和徐蓉舫抱头伏匿在瑞春染坊的一口大厨内，至晚人静时，才偷偷划船逃进姚城。

第二天，知县汪文炳带领官佐、武弁、衙役下乡弹压踏勘。他们由水路到达低塘暂驻，不敢直进周巷。待察探人员来报知周巷已经平静之后，才开船进入周巷。他们将周巷镇及沙黄村搞得鸡飞狗跳，进行了一番例行公事。

当时，沙黄村一夕数惊，沙来狗、沙来春、沙春和、沙阿周、黄福盛、黄福增几人只好逃到上海，在租界里匿居。不知怎么，竟被陈增云侦悉，雇了几名无赖到上海租界捉拿。但是遭到外国巡捕的干涉，以“越界捉人”的罪名反将陈增云捉去，坐了一个多月的巡捕牢房，待余姚县行文证明才得获释。过了二三个月后，通过关系才将沙来狗、沙来春、黄福盛从上海提解到姚，关押入牢。直到宣统元年（1909）汪文炳卸任时，因实际上对沙来狗等三人无罪可判，又正好遇上宣统登基颁发大赦令，汪文炳就借机“施恩”，将三人具保释放了事。

事后，民间艺人曾将这一事件编成故事说唱《打“浆局”》。其中唱道：

日出东方一点红，处处地户都赶拢。先打“浆局”唐茂昌，后打增云横河塘，过西打之徐蓉舫。冷不防洋枪架到窗格上，打死了一个卖布郎。吃住一份徐六房，翻转复手打学堂。举人老爷喊地方，逃出后门县里上。一只划船欵乃欵乃摇到花厅里，余姚县官吃一惊。赶拢差人一大阵，赶到沙黄去拿人，沙黄人

逃得尽干净。

注：“浆”指鸦片的浆膏。“浆局”是收浆税的机构。

（本文根据一九六六年姚慈两县县志办公室搜集的资料整理）

日寇在姚罪行录

诸焕灿 整理

芦沟桥枪声一响，“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在日寇侵占大半个中国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余姚也不例外。今天录其罪行，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血泪控诉。

余姚自一九三九年，就遭到日寇飞机的狂轰烂炸，仅在沦陷前夕，本县境内就被轰炸了十六次，共炸毁房屋二百五十余间，炸死四十三人。下面将日寇轰炸罪行实录如下：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农历四月廿四日），日机两架，轰炸姚城闹市区——桐江桥以南的虞宦街（即新建路），投下燃烧弹二枚、开花弹四枚，炸毁街道两旁的街西阿华面店至中国垦业银行；街东施协兴软糕店至茂昌豆粉店共七十多间店房，成为一片焦土。炸死一名牙科诊所学徒殷定海。

七月六日（农历五月廿日），又投弹六枚，炸毁县东街、都司前、后滨江、绪山门口、第一山弄口、仁寿桥西滴露庵门前等六处，炸毁房屋二十余间，炸沉盐船二只，炸死四人。一名妇女被炸死后，骨肉纷飞，一条腿落在火弄口东，另一条腿飞落在都司前东路口的石狮子旁。还用机枪对地面大肆扫射，打死三人。

八月十六日（农历七月初二），投弹四枚，炸毁府前路小